

# 决策参考

## Jue ce can kao

第三十四期（总第 284 期）

盐城市图书馆编

2007 年 9 月下

主编 刘进 责编 周玉奇

[zhouyuqi@gmail.com](mailto:zhouyuqi@gmail.com) 13905103528

编者按：盐城是江苏土地面积最大、海岸线最长、滩涂最多、沿海腹地最广的城市。盐城拥有两个国家一类开放口岸，是江苏重要的土地后备资源和农副产品生产基地，资源十分丰富，生态比较独特。盐城与上海有着不解的渊源。上海与盐城地域相近，人缘相亲，在经济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接轨上海是我市的一项重大发展战略，也是我市今年七项重点经济工作之一。接轨上海专项规划汇报会 8 月初举行。9 月下旬，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赵鹏，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率市党政代表团赴上海进行考察访问，寻求战略合作。访沪期间，上海盐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会在沪成立，从此，我市接轨上海工作增添了新的平台。本期推出“接轨上海”专题，供领导决策时参考。“他山之石”和“专家论坛”栏目相信也会引起您阅读的兴趣。本刊乐意为您提供定题服务，也等待您的回音。

### 要目

#### ● 本期专题接轨上海

靖江如何接轨上海

长三角“接轨”上海三大误区

葛剑雄：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

#### ● 他山之石

巴黎城市排水系统对我们的启示

德美医改模式对我国的正负借鉴

#### ● 专家论坛

中国懂金融的市长不超过 10 位

## ● 本期专题接轨上海

### 靖江如何接轨上海

三年前,鲜有名气的苏中县级市靖江在长三角乃至全国一鸣惊人。

如今,将近三年时间过去了,靖江江阴跨江联动进展如何呢?在推进这一过程中,遇到哪些棘手的困难和问题,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作为“江苏省沿江开发的先导区、试验区和示范区”,靖江在沿江开发战略中如何接轨上海?请听泰州市委常委、靖江市委书记刘建国一席谈。

#### 跨江联动：行政樊篱最棘手

“最让我棘手的事还是行政的束缚。如果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劲往一处使,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刘建国称,有时江阴认为某一方面该归江阴管,靖江则认为该归靖江管。作为从江阴来的靖江市委书记,他只能“用行政力量解决行政问题”,尽力协调好双方利益。垂直部门则由省政府明确专人协调。

当初,江阴靖江双方承诺:靖江园区建设由江阴投资 90%,靖江投资 10%;江阴负责园区经济事务,靖江负责园区社会事务;园区建设十年内,靖江、江阴不从园区提取一分钱税收,所有收益都用于园区再建设。

刘建国表示,目前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关系已经基本理顺,已由前期基础设施建设阶段转向项目建设阶段,已有包括特色冶金在内的一批江阴产业转移至靖江园区。今年园区将进行大规模项目建设,将有一大批项目进入,包括一家投资 42 亿元、全国最大民营船厂从江阴转移至园区。

跨江联动也给靖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靖江人从跨江联动中已经体验“新婚的甜蜜”。几年前,靖江人的目标是“人均苏中争第一”,现在这个目标已经升格为“学赶苏南,后来居上”。

今年 1 月 24 日,江阴靖江联动开发协调委员会第 3 次会议在靖江召开,双方宣布:两市各派两名干部到对方担任副市长一职,挂职两年。有评论说,此举“标志着两市联动进入了新阶段”。

#### 沿江开发：起步价 1 亿美元

“要想去靖江投资沿江开发,可要早点去。去晚了,就没机会了。”面对上海市国资委、经委和沪上国字号大企业负责人,刘建国的话似乎有点让人迷惑不解。在这些被其他县市奉为“座上宾”的腕儿们面前,刘建国的矜持给人一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感觉。

随着江苏沿江开发大战略的深入实施,长江岸线资源成为中外商家争夺的焦点。据了解,靖江是江苏沿江拥有深水岸线最长的市,境内 52.3 公里长江深水岸线被誉为“黄金水道中的白金岸线”,可建 50 座万吨级码头。长江下游岸线平均只有 28%为深水岸线,而靖江水深超过 10 米的岸线就有 35 公里以上,占总长 65%,大部分都未开发。

在前不久的一次采访中,靖江邻近县市的一位领导告诉记者,“靖江招商引资胃口很大,低于 1 亿美元的项目,他们是瞧不上眼的。”

靖江利用外资水平真的已经“牛”到以亿美元为单位了吗?

刘建国表示,长江岸线资源非常宝贵,开发一块就少一块。之所以设定沿江开发单个项目投资不少于 1 亿美元的门槛,也是出于保护和开发并重的考虑,更好发挥岸线价值。“如果没有一个规模限制,优质深水港口资源浪费了才是最大的损失”。

根据规划,“十一五”期间靖江市沿江公用码头将达 16 座,其中万吨级泊位 14 座,货物吞吐能力达 2500 万吨。上海洋山港开港后,靖江计划运用其港口水深、交通便捷、劳动力成本低等优势,竭力成为洋山港的“卫星港”,接受洋山港的辐射,将靖江港口经济纳入国际经济循环圈。

不过,刘建国同时表示,“靖江欢迎大项目,同时也欢迎中小项目来投资。不论项目大小,靖江都会提供一样的优质服务。”

### **接轨上海:专业园区集中导入**

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一直是靖江的梦想。

目前,靖江有 400 多家企业为上海产业配套产品。从 2000 年华源制药股份公司收购江苏靖江葡萄糖厂开始,已有宝钢、农工商、世纪联华等 10 家大型工商企业投资靖江。当然,靖江人志向绝不止于此。

有关专家指出,“十一五”期间,上海将引导 5000 家传统制造业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向外转移,其中大部分将是国有企业。以前几次产业转移更多惠及苏南和浙北,这次上海的产业转移最大的空间在苏中、苏北,而作为苏中苏北桥头堡靖江,无疑可以从中分得一杯羹。

刘建国表示,靖江正在加快全面、深入融入上海经济圈子的步伐,从产品配套互补跃升到寻求产业联动,接受上海产业的梯度转移,努力打造长三角国际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

靖江凭借什么接轨上海？刘建国说，除了区位优势和港口资源外，靖江经济的快速发展将给上海企业家提供巨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经济工业经济年均增长 30%至 40%，城市化以每年 2%至 3%的速度增长。“如果要打个比方的话，江阴就像发展相对成熟的香港，而靖江则是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深圳”。

其实，靖江产业发展已经颇具规模。就拿船舶制造业来说，靖江市计划在 5 年内，做大做强船舶制造业，船舶产业年销售超 300 亿元，就业人数超 4 万，“十一五”期末力争形成年产 300 万—400 万吨的船舶生产规模，跻身全国造船业前 5 位。

此次，靖江在上海召开经贸洽谈会，主要目的是想向沪上企业推介其规划面积 150 平方公里的省级靖江经济开发区。

“至于上海企业投资靖江的合作模式，可以灵活多样。”刘建国表示，既可以采取江阴开发区靖江园区的做法，也可以由上海企业与靖江联合开发城镇建设，靖江甚至已计划建立专门的产业经济园区，吸引上海产业集中导入。（《国际金融报》）

## 长三角“接轨”上海三大误区

长三角几乎所有城市都在说接轨上海，然而，具体到如何接轨——是简单的产业转移、招商引资，还是需要更为深远的发展战略和“转移布局”？接轨的核心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思想观念、市场环境？长三角或许需要一场对“接轨热”的反思。

### 推介活动接二连三

随着洋山港一期启用和上海宣布 2010 年前搭建好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框架，一种新的经济现象在长三角显山露水。

今年以来，江苏各地在上海举办的推介会名目繁多，令上海当地企业颇有些应接不暇。“如果能查到上海的出入境人员名单，人们将会发现，除了在上海有经常性业务的商人，今年进出上海最频繁的人员就是江苏各地政府的官员。”上海当地媒体的一名资深经济记者感叹说。

目前，江苏等地正涌动着一轮接轨上海的热潮：地级市“跑”上海，县级市“跑”上海，甚至一些乡镇负责人也频繁奔走在通往上海的旅途中。

在长三角不少地区，吸引上海产业转移、搭建与上海沟通的平台已成为衡量官员办事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个别地方甚至成立了“接轨上海办公室”。

## 产业承接不成系统

在各地的“接轨”计划中，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继续被摆在极端重要的位置。接受记者采访的有关人士提出，从长三角当前的情况看，基础设施建设固然重要，但观念及城市战略的建设更为重要。

不少专家认为，目前部分地区的“接轨上海热”存在三大误区——一是重视以基础设施建设及产业引进为核心的“硬接轨”，忽视市场环境及观念层面的“软接轨”；二是招商引资重“量”轻“质”；三是承接产业转移“以大为美”，不去分析自身资源、产业优势，“承接战略”缺乏系统观。

江苏省委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祖强告诉记者，在苏北某些地区存在“招商引资一票否决制”，当地干部引资压力很大，引资质量也参差不齐。“尽管这些地区有着产业基础薄弱等客观困难，但也必须承认，投资饥渴导致了盲目引资，政绩冲动引发了不顾自身资源、不成系统的产业承接。”祖强说。

## 我们拿什么接轨上海？

面对专家们对“接轨误区”的质疑，一些城市安之若素，一些城市则开始反思。南通海门市距离上海直线距离不到60公里，有消息表明，2008年苏通大桥、崇启大桥、崇海大桥与沪崇过江通道通车，2010年沪通铁路建成。届时，南通将全面进入上海1小时交通圈。

但是，这一重大“接轨利好”能否导致南通经济的高速增长呢？就此，当地曾经有过一场激烈的辩论，有人说大桥通车之日是南通经济腾飞之时，也有人说大桥通车之日未必是南通经济腾飞之时。“我们南通市委、市政府经过深入思考认为，对于南通而言，大桥是把‘双刃剑’。大桥通车后，南通与上海的距离近了，这对南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发展机遇多了，但不能发展空间没了，南通要规划好、控制好，为未来的发展预留空间；要素流动方便了，南通需要培育自己的优势，将上海的要素吸引过来。”常务副市长蓝绍敏对记者说。（据新华社）

## 葛剑雄：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

### 上海文化优势的重要原因

我个人认为，上海之所以能够在文化上具有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少有的优势，应该承认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租界，一个是移民。尽管租界产生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它

是违背中国人民意愿的，并且是中国人的耻辱，但它客观上为一种新文化的产生，为一个新的国际大都市的诞生提供了一定意义上的文化基础。但是有了这个基础之后，真正的文化创造靠什么？还是靠上海的人，其中就包含了人的互动交流，不断地交流。

1843年开埠以前的上海，客观地讲，它的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处于中等水平。尽管它所在的地区是中国最近一千年来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最先进的江苏松江府，但是，当时的上海县在松江府中不过处于中等地位，无论是它的文化底蕴，还是它当时的文化状况，都抵不上松江府的华亭县，抵不上青浦，甚至抵不上嘉定。跟苏州、杭州、扬州、嘉兴、常州相比，上海不过是一个县城，显不出多少优势来。但是，在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到上世纪初期，国内外公认上海已经具备了文化方面的某种优势。

除了租界以外，靠什么呢？应该讲就是靠人口的流动。在上海刚开埠的时候，整个县的人口仅仅50万多一点，但是，到1900年，上海的人口突破100万；1915年，人口突破200万；1929年，达到300万；1942年，已经接近400万；到1949年上海解放，人口是550万，加上流动人口号称600万。这样的速度，在国际上是少有先例的。我比较过伦敦，伦敦的城市化发展速度也非常快，但是在人口增长方面，无论是从速度，还是从外来人口的比例来讲，都没有上海那么快、那么高。上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外来的移民占到总人口的80%，而且这些人多数是以定居为目的。从文化交流上讲，起作用最大的是对本地产生归属感的移民。

### 上海外来人口素质高、多元化

上海的文化交流靠什么？就靠大批外来人口。这批人又是素质比较高的。上海主要的移民来自浙江和江苏，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又来自长江三角洲。这些地方是从五代到北宋初年开始，已经在经济、文化方面处于先进地位的地方，并且久盛不衰。所以上海流动人口来源的地方本身就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相对而言，这些移民的素质是比较高的。还有一些人尽管不是来自发达地区，但是能够在上海生存下去，是因为有他们的特长。所以，上海移民本身素质高，传播文化的能力就强。

另一方面，它是多元的。比如说，除了江苏、浙江以外，还有一批很重要的移民来自广东。清朝在五口通商以前，唯一开放的口岸就是广州，广州早就积累了一批涉外人才。上海在刚开埠的时候，涉外人才十之八九来自广州。从一般的服务员到打字员，到洋行的买办，都清一色是广州人，以后才慢慢增加了苏州人、宁波人、本地人。广东移民在上海有很多优势，南京东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全是广东人开的。

又比如来到上海的安徽移民，在上海的商业中，特别是在华界的商业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湖北人，因为当年张之洞在湖北办洋务，在铁路、机器制造、开采矿产方面，湖北有一批人才，在上海办洋务、造铁路、搞机器生产的时候，他们就发挥作用了。跟天津等其他移民城市相比，上海的国内移民是最多元的。

几乎在全中国，没有一个地方的人当中没人移居上海，没有一个少数民族的人当中没人移居上海。这就使上海的文化吸收了各方面的营养，也使这样一些差异很大的文化在上海汇集起来，进行交流。

### 几支外国移民在上海的文化交流中起了大作用

上海刚开埠的时候，只有 26 个外国人。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期，上海外侨达到 15 万人。这 15 万人还不包括流动人口，是经登记的、在上海常住的侨民。其中有几支外国人群体起的作用显然更大。

一支是犹太人。我们知道，沙逊、哈同、嘉道理家族中，很多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上海这样一个新兴发展起来的工商业、服务型国际大都市中，如鱼得水。讲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这个话是西方人说出来的。“冒险家的乐园”有两层意思，一方面当然包括有些人利用非法的手段获取财富，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人到上海，他们承担了风险并且也获得了成功，所以才成为乐园。包括后来在欧洲，法西斯驱逐犹太人以后，很多犹太人把上海视为他们的乐土，因为当时他们在欧洲，在世界上很多大城市都被驱逐，但是在上海，他们可以自由地登陆，非常容易地定居，所以在上海，犹太文化曾经起过比较大的作用。

另一支是白俄。俄国革命以后，被驱逐出境的那些俄国的上层、贵族和知识分子，相当一部分人到了上海。他们对西方文化与上海文化的交流，比如在音乐、绘画、舞蹈、语言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很多在上海学习西方文化的人，就是跟着这些白俄知识分子学的，在上海一些主要的艺术社团里，白俄移民都起了作用。

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日本人。日本人在上海的活动，在文化上对上海的影响不可小觑。这其中，有的是正常的文化交流，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中国有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包括很多社会学词汇，有很多是通过上海从日本传过来的。有些日本教科书，通过上海的一些机构，将影响力扩大到全国，而被我们所采用。

另一方面，日本也利用上海在文化上进行渗透，进行他们的活动。日本通过上海做了大量调查，掌握了中国很多方面的资料，也通过上海购买了湖州大藏书家陆心源的宋楼，把那里的珍贵文化典籍统统拿走。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人在上海也购买了不少日本的珍贵典籍。

可以看出，上海的文化交流，不仅在国内，也有来自国际的影响。

所以当时上海的文化交流，可以说是一种地域性的。比如上海跟苏浙等地的移民的交流，以及跟流动人口的交流，这是一类。这方面的成果很多，有些已经远远超出了交流的范围，得到了新的提高。比如越剧，越剧发源于浙江嵊州，当时叫嵊县，但是它原来在浙江的时候，只是演演草台戏，层次比较低。它真正成为有影响力的剧种，是在上海。在上海通过知识分子的介入，帮助其总结、提高，以及利用上海这样的舞台，使它演到全国。

第三个层次就是传统和现代的交流。我们提到这个问题时，有人觉得不理解，

上海既然是这样一个现代大都会，它的传统体现在哪里呢？因为，传统文化的拥有者，他们也会到上海来。这样，上海在近代这段时期内，就发生了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交流。它的结果，我认为是相当积极的。

### **人口应该有进有出，交流不应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

当时的上海，由于处在这样的交流中，它的人口绝不是只进不出。比如说，上海在迁移的高峰时候，每年迁入人口大概在 50 万左右，但是每年迁出多少呢？上世纪 30 年代，有好几年迁出的人口在 45 万以上。就是说，上海的人口尽管增长，但是曾经有进有出，交流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并不是所有人才都要集中到上海来。我举几个大学的例子。当时在上海周围地区的几所大学，应该说都是各有千秋。比如苏州的东吴大学是当时中国法学水平最高的学府之一，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以后，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的几位大法官、法学界的泰斗人物，几乎都是东吴大学出来的，他们并没有因为上海重要都迁居到上海来。

又比如复旦大学，1980 年的时候拥有 10 位科学院院士，但这 10 位院士中有 8 位是原来浙江大学的。1980 年，浙江大学的院士有 40 多位，但并没有因为上海强大，这些人才就都非要来上海不可。还比如说以前的无锡国专，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很多研究国学的大师级人物都是在那里主讲或在那里受过训练的。

而上海的一些大学呢，复旦大学开始是私立的，后来变成国立，它当时比较见长的是新闻学、心理学，还有农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工程学出名；同济的医科、土木工程学出名。相互之间交流的结果是互补的、互相促进的。当时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人是在上海念的大学，然后到江苏去做小学教师，再到浙江去办一所中学，然后又回到上海，是处于一种良性循环的交流过程。这样的交流对双方都是互利的，在这个过程中，江苏、浙江的文化也得到很大的提高。前几年，我让我的学生去做社会调查，他们发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不少小镇以前都曾经有过好几种报纸和杂志。这些办报的设想是从哪里来的呢？有很多都是从上海学的。



但是非常遗憾，从 1958 年国家制订法律，人口不得随便迁入城市开始，体制以外的人员流动都停止了。

### 行政区划、单位所有、有进无出，是阻碍文化交流的三个主要因素

这种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今天，一方面资讯发达，另外一方面交通越来越便利。但是与此同时，阻碍文化交流的因素依然存在。首先是行政区划。以前上海如果要做什么事，比如当年南京梅山钢铁厂要划归上海，那里就要通用上海粮票、上海户口，就只能用行政区划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文化的自由交流很难实现。

第二个因素，就是单位所有。我曾经跟史晋川先生讲，你就是复旦的人才交流到了浙大。而现在的交流呢，要么我们想把他们的人才“挖”过来，要么他们想把我们的人才“挖”过去。如果不“挖”，正常的人才交流还能不能进行？还有，现在这种交流，我们往往认为人才归了你，我这里就削弱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通过交流，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样，让双方互补互利呢？

第三个因素就是，现在往往是有进无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这几年，上海敞开大门欢迎人才进来，但是出去了多少人？如果一个人才在上海发挥不了太大的作用，他会不会出去？现在看来，很少。还有，上海的文化假如说真的要影响国内其他地方，或者世界其他地方，人才不走出去，不去进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行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今天必须面对的。正因为这样我才愿意，也希望用这个观点跟各位交流，那就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流动。（据《解放日报》）

## ● 他山之石

### 巴黎城市排水系统对我们的启示

今夏以来，北京城区雨水不断，雨水在润泽大地的同时，也让我们陷入了“甜蜜的苦恼”。8月1日夜的一场大雨，导致北三环多处路段被淹，安贞桥、望和桥、安华桥等积水严重。8月16日下午，一场暴雨再淹北三环安华桥，现场汪洋一片，导致了数小时的交通拥堵。下水井倒灌、立交桥下变“游泳池”、车辆“没顶”消失、众人慌忙逃生、救援人员现场紧急排险……这样的场景让人不由想到2004年7月那场暴雨。

那场暴雨之后，北京市下决心改善暴雨的应对工作，比如，提高短时暴雨预报的准确度和精确度，决定花大投入建造 20 座气象预警塔；加强气象灾害应对工作的部门联动，提高应急机制的效率；重新计算立交桥区的排水量，对多处积水点排水泵站进行了改造等。

但从今年的情况来看，对暴雨预警不够精确，以及预警发布渠道的不足却是事实。车辆频频“没顶”，应急救援的效率亟需提高；立交桥区的排水量重新计算的工作不够严谨，像安华桥，等到两次被淹后，才得出排水能力不足的结论。

不过话说回来，是否我们把应急措施做得天衣无缝，就万事无忧了呢？当然不是的，正如学者所说，“应急预案固然重要，但预案是着眼于各种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应对，公众更需要从根本上防止和减少各种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应急，说到底是一个非正常措施，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启动。

因此，当下，一方面要继续改善极端天气下的灾害应急机制，另一方面，也要认真反思，为什么不能从源头上减少应急事件的发生？

在巴黎的雨天行走时湿鞋的情况都很少见，也从未发现下雨积水导致的交通堵塞。之所以如此，巴黎发达的排水系统功不可没。巴黎的下水道密如蛛网，总长达 2347 公里，并且，这些下水道宽敞得出人意料：中间是宽约 3 米的排水道，两旁是宽约 1 米的供检修人员通行的便道……巴黎“地下”的现代化，丝毫不逊色于“地上”。

而在北京，“地上”与“地下”对比犹如巨人与侏儒，城市地表的建设水准较之巴黎不遑多让，但地下呢？——排水设施建设滞后于城市扩张，有的地方还用着明清时代下水道，一些地下雨水管线甚至仍和污水管线共用一条管道……此外，北京建了大量立交桥，而这些立交桥同时制造了大量“人工洼地”，加大了排水困难和洪涝风险，而在国外，很多城市已经开始摒弃过多的立交桥。

北京一次次在暴雨中“栽跟头”，说到底还是城市规划和建设的“病症”反映，如果每次都只是“消炎止痛”，而不根治“病因”，那只能在困境中循环往复。暴雨无法阻挡，但可以像巴黎一样，通过前瞻、科学的规划和建设，让雨水降落地面迅速了无踪影，将暴雨的危害巧妙化于无形。这才是一种高明的城市治理策略，也是北京摆脱“暴雨困境”的出路所在。北京是这样，中国的其它城市呢？（《区域综合开发》2007 年第 31 期）

## 德美医改模式对我国的正负借鉴

不像国内患者就医去医院，德国的病人很少去医院。医院一般只是负责住院病人以及节日期间的急诊服务。大多数德国人患病后先联系家庭医生，在家庭医生处理不了的情况下，会转到专科诊所。这种诊所通常只有一至三名医生。但这种看似精耕细作的医疗服务，也有大量的医药回扣。

德国拥有很强大的医疗工业。世界上各个角落出售的阿斯匹林，绝大部分产自德国。根据德国的法律，在新药上市前，要经过严格的药理试验，于是各种诊所就成为试验的场所。医生不断地收到各个公司的新药疗效调查要求。经过无数个诊所的疗效测验，药品的可靠性得到提高，缺陷相应降低。但是许多药品公司往往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用疗效调查作为回扣的“遮羞布”。一些公司甚至不是请医生对新药做疗效调查，而是拿出已使用多年的药品，来做疗效调查。目的很明确，一是医生给病人多开这种药，促使患者医药费上升；另一个就是排挤其他竞争对手。’

一般来说，医生填写调查报告后，会获得 5-10 欧元的回报。但是医生如果成功劝说病人用医药公司推荐的药品，医生另外可获得数百欧元的报酬。这其实与我国的医疗回扣是基本一样，只不过所用的名目不同。

为了遏止这种医药腐败，德国制药工业制定了“自愿自我监督准则”。准则规定家不得以疗效调查的名义，对医生开方用药施加影响。但就像我国的医药协会一样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

看看德国政府为医疗改革开出的处方：提高医疗保险费用，取消原来一切都是免费的医疗，改为对于基本医疗收取部分费用。原来的免费就诊改为每季度收费 10 欧元，住院治疗时，病人要交纳 10% 的住院费用，但是设定了一个 300 欧元的限额。成立联邦药品质量与经济检验中心，从疗效和价格的角度对药品进行检验，向医生提供有效药物清单。医生开药要依据药物清单，从高度自由的欧洲人来看，如果医生经常开大处方，也许他们会考虑换一个地方治疗。

但是，让病人负担 10% 的住院费及每季度 10 欧元的门诊费，同时上有封顶。这种力度在德国人高收入的现状面前，只会发挥极其微弱的作用。而联邦提供药品清单，并不能堵住医生的各种借口，因此也不是上策。

反而是美国的方法值得借鉴。即，引入保险公司来监督医生。除了老人和穷人之外，大多数美国人的药费，由私人保险公司来承担。而私人保险公司最关心自己的利益，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努力保证保费减去支出还会大于零，因此，他们会密切关注各个医院医生的开药情

况，把每家医院的开药清单拿来细细琢磨，从而防止大处方。如果确认哪家医院的医生一直开大处方，他们就会考虑取消这家医院的“定点”资格。一旦失去这种“定点”的资格，医院的生存就会成问题，因此，医生和医院在这种压力下，当然会考虑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平衡。

德国的 359 个法定医疗保险公司，大多数也是公共事业，与我国的医保中心一样，因此，监督力度自然较弱。从这个经验来看，我国的医疗改革如果能集德国和美国之长比较好。（《区域综合开发》2007 年第 29 期）

## ● 专家论坛

### 中国懂金融的市长不超过 10 位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作为城市经济的命脉，其地位与作用越来越重要。发展经济首先需要有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需要有懂金融的市长，需要有懂金融的市长亲手营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然而，在我国真正懂金融的市长严重短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懂金融的市长不超过 10 位。而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和大连市市长夏穗仁在城市金融建设中取得的业绩，则诠释了“金融市长”的巨大威力。

也有很多城市确定目标，要把自己发展成为某种中心城市、某类金融中心，但是，这些城市的决策者似乎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自己是否是一个合格的“金融市长”？不容否认，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政府政策、市场活力、市民支持等多种要素，但最重要的还需要有个懂金融的市长。上述三位市长的事例就充分体现了懂金融的市长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包括可以给城市发展带来活力，可以促进城市的直接间接融资，协调政府和企业资本市场的关系等等。除北京、天津、大连之外，重庆市副市长黄奇帆、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应该也在夏斌所言的 10 位懂金融的市长之列。2001 年进入重庆后，被誉为“金融市长”的黄奇帆始终坚定不移地推动着重庆“金融兴市”的改革。事实上，在重庆经济中扮演重要作用的 8 大国有建设性投资集团的筹建、西南证券的重组、渝富公司收购、重庆工商银行 200 亿元的不良资产等多个事关重庆金融业发展的事件中，背后都有黄奇帆的身影。他公开表示，重庆要做西部金融重镇，要做中国的芝加哥。深圳市市长许宗衡则要将深圳打造

成最适宜金融业发展的城市，也就是

把深圳建成“金融之都”。许宗衡复兴深圳金融的优势在于深圳与香港的地缘关系，2006年深圳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深圳金融业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大力推进深港金融领域的深度合作，许宗衡亲率大型金融招商团访港，大力吸引港资金融机构驻扎深圳，深港金融合作走向全面提速的快车道，深港金融合作模式也由此确立。正是基于上述业绩，黄奇帆、许宗衡同戴相龙、夏穗仁同时当选为“2006年中国首席金融市长”（共6名，还有北京市副市长翟鸿祥、上海市副市长冯国勤）。

实现强市富民目标，需要城市的管理者们成为“经营通”，更要成为“金融通”。在这里，所有市长都应该自问一句：我懂金融吗。如果不懂，那就赶紧补课吧！